

中共三大与建党初期的工人运动

李超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自成立起就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这次高潮直至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而结束。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中共三大, 总结了党领导工运工作的经验, 专门制定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正确方略; 同时, 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也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中共三大后, 中国工人运动走向了复兴和再次高涨。

关键词: 中共三大; 工人运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中图分类号: D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1)04-0012-07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 中国从此有了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自成立起就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工人运动如旭日初升, 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一、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国工人运动的勃兴和挫折

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在一大上, 年轻的共产党对本党的基本任务进行了规定, 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地指出: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 均应组织工会……党应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2] 可以看出,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其基本任务与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1921 年 8 月,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中共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主任为张国焘, 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宣言》中公开表明该机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 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 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 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 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密切关系。”^[3]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 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以海员、矿山、铁路等产业工人为主的一系列罢工运动。从 1922 年 1 月起, 至 1923 年 2 月, 中国工人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在长达 13 个月里, 全国“大小罢工在一百次以上, 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以上。”^[4] 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直接领导或党通过其领导的工会组织间接发动的。

1922 年 1 月, 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当时, 香港海员的生活非常困苦, 工资微薄的同时, 又要遭受到包工头的重重剥削, 工资待遇与外籍海员相比极低, 还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海员中的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 深刻地认识到工人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 在他们的领导下, 香港海员工人于 1921 年 3 月正式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征、林伟民是工人中有较高阶级觉悟的代表, 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海员工会先后三次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 但都遭到拒绝。中国海员在忍无

收稿日期: 2021-06-01

作者简介: 李超 (1986—), 男, 满族, 辽宁铁岭人,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馆员,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可忍的情况下，在1922年1月开始举行罢工。

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香港海员的正义举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给予支持，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后方支援组织，并向罢工海员捐款。共产党广东支部印发了《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号召罢工工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5]

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持续长达56天，沉重打击了港英当局。1922年3月，港英政府和资方被迫向工人屈服，罢工运动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次罢工运动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显示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

在全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潮之际，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来共173人，自12个城市，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

大会在5月6日结束，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大会团结了全国工人阶级，“引领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同时决定“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工人运动“全国唯一的领袖”之地位。^[6]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分析和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党领导工运的经验，提出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工人运动的议决案，即《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进一步明确党领导“工会运动”的方向。

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京汉路长辛店工人、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工人、唐山制造厂工人、京绥路车务工人、正太路工人相继掀起罢工运动，这些运动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工人的觉醒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视，他们伺

机进行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共领导第一次工运高潮的顶峰，也是这个高潮“最后一个怒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工人的觉悟不断提高，陆续组建工人俱乐部，逐渐成长为一支重要力量。至1922年春，京汉铁路各站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为整合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计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军阀吴佩孚担心工人运动高涨会威胁其统治，于是撕下了“保护劳工”的伪装，采取高压政策，坚决反对和破坏总工会的成立，“并云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7]。2月1日，“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8]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舍生忘死，在吴佩孚爪牙的枪口下，冲破重重阻挠，到达郑州普乐园剧场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召开后，吴佩孚软硬兼施，百般恐吓，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得不转移到汉口江岸办公。为反抗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并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战。从这个口号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人运动已经从单纯的为增加工资、提高待遇的经济斗争阶段发展到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政治斗争阶段，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进步。

2月4日，全路2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京汉铁路瘫痪，声震全国。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屠杀罢工工人，“当时死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损失。”^[9]

二七惨案后，几乎整个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路沿线的铁路工会组织全部都遭到破坏。“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进入于消沉时期了。”^[10]

二、中共三大制定了指导工人运动发展的正确方略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一次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背景下召开的，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

（一）大会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和作出的相关决议

1. 大会的前两天，主要是由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们发言讨论陈独秀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是对中共二大后中央工作的系统总结。由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规模大、影响深，陈独秀因此在报告中多次提及该次罢工。报告还汇报了罢工期间党的宣传出版工作、罢工失败后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损失情况，并初步分析了“中央委员会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11]

2. 之后，大会开始着重探讨工运工作，由张国焘作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陈潭秋作有关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京汉铁路大罢工善后情况的报告，他还在大会上分发了刚刚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每个代表人手一本^[12]。此外，罗章龙也代表北方区作了总结京汉铁路大罢工经验教训的报告，并印成文件。

代表们在总结罢工运动经验教训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有些同志认为罢工运动“打了败仗，得不偿失，牺牲很大”；但毛泽东等大会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比较一致，即罢工运动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罢工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影响是主要的”。^[13]后来，共产国际在来信中指出这次罢工运动是正确的，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走向世界革命舞台，意义重大。

3. 为加强对全国劳动运动的指导，大会专门通过了《劳动问题议决案》（即《关于工人运动问题的提纲》）^[14]。议决案对全国工人运动的总体形势进行了判断，认为“中国目下劳动运动应取守势”，尤其强调了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特别指出了要立即恢复工会口号，以及加强在被查封的工会中和被压迫的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引导他们开展政治斗争。这份议决案针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后的严峻形势，要求“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

‘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

议决案分析了各地工人运动的不同特点，指出了各地工人运动应采取的特殊策略，如“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亦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大会认识到了妇女在工运中的重要作用，在议决案中主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工人运动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干部队伍的培养工作和素质的提高，议决案因此提出“为养成劳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

议决案还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规定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提到了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在开展工人运动时的注意事项；号召了中国工人运动要与赤色职工国际走向联合。针对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这一问题，并为“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议决案提出了下列工人运动口号：

- （一）男女工资平等；
- （二）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
- （三）推翻包工制；
- （四）星期日休息。

可见，这份议决案虽然只有六百余字，但内涵丰富，既有宏观指导又有微观分析，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运遭遇挫折的紧急关头，制定的一份总结过去、开启未来的工运斗争新方略。

中共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纲草案。草案共分为九大部分，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近代中国的政治现象、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这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最后一部分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目前最小限度的党纲。

最小限度的党纲中从八个方面列明了维护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如要求“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

有权参与之。”“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救济失业之工人”^[15]等等。可见，中国共产党已将维护工人利益和具体要求旗帜鲜明地写进党纲，更加明确了未来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二）大会确立了促进工运发展的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无论是理论储备，还是实践经验都还不足，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对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持排斥态度，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写到：“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6]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逐渐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采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斗争策略。

而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是比较民主的且有一定实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最适合建立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但直至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所取得的成果还仅限于达成了党的少数干部先加入国民党的口头协议，并未形成书面决议。很明显，这次会议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来完成民主革命的重任。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而残酷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仅仅依靠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

于是，在中共三大上，探讨与国民党的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就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尽管“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17]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

会，他积极主张“我们的党员是应通过加入这个国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18]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和集体表决，在6月17日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该议决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9]

这份议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确立了采用“党内合作”的方式，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

中共三大成功开创的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从宏观而言“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孙中山这面极具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更加广泛发动群众，更充分发展革命力量，促成了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中共能够日益发挥作为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20]

从工人运动这个微观视角来看，中共三大的正确决议，有利于年轻且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内合法地活动，利用国民党在工人中的基础，及国民党领导的工人组织的基础，加强对工人和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工人运动干部，扩大工人运动声势，这为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和迅速高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和高涨

中共三大闭幕后，共产党员认真落实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中国工人运动也开始走向复兴和再次高涨。

为促成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设立工人部，由廖仲恺先生任部长。由于廖仲恺职务甚多，工人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工人部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具体负责，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工人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大革命中心

地——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开始有了复苏的气象。

长期以来，“广州之工会组织，名目繁多，品类复杂，影响工人内部的团结。”^[21]中共三大奠基的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后，加强了国共两党在工运方面的合作。1924年5月，由中共广州地委牵头、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在广州召开了工人代表会，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由刘尔崧、鲍武、黄天伟、周祯等共产党员任常务委员，“工代会”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刘尔崧具体负责，这次会议促进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进一步发展。

1924年7月，在中共广州地委的领导下，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动沙面数千洋务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侮辱中国人的“新警律”，斗争取得了胜利，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这是自二七惨案以来，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标志。

1925年5月1日，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160多个工会，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对中国工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工人运动高潮的再次到来。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争取正当权益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罢工运动在各地工人的支援下取得胜利。5月7日，日本资方片面撕毁协议，并蓄意破坏工会活动。15日，日本资本家向工人开枪，枪杀进步工人顾正红，这一严重的流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5月30日，英国巡捕向同情工人的游行群众射击，死伤数十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从6月1日起，上海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形成了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相继有20余万。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同时号召“全

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22]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重庆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矿区，以工人为主力的1700多万群众也迅速行动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觉醒带动了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的觉醒和团结，以至于“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23]

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1925年6月23日，香港和广州10万余工人群众在广州举行大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面对岸沙基路时，“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国军舰，纷纷放机关炮、大炮助击，弹如雨下”^[24]（后来，葡国驻穗领事致函广州革命政府，否认葡国军舰开炮），当场死伤200余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1925年7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和顾问。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余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的广大群众封锁香港，杜绝与港英政府的经济往来。与中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也给予罢工运动大力支持，邓中夏曾评论说：“假如当时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星期便要垮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25]

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次罢工运动前后长达16个月之久，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

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与其他被发动起来的工人一样，在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南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有数万罢工工人在此高声助威和实际援助”，广东地区“不到数月，情形大大改变了。内部肃清，东江收复，

南路底定，历年来糜烂不堪的广东，由此归于统一了。”^[26]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努力参过国民革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一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27]在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调运兵力和物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罢工工人组成宣传队、卫生队以及3000余人的运输队随师出征，工人们不避艰难险阻、湿热酷暑，为北伐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国的工会组织也发展迅速，至1926年底，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

为配合北伐进军，早日瓦解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于1926年秋至1927年春，连续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中国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28]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面貌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军阀制造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遭遇重挫，并由此进入到一段“消沉期”。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和总结相关工作经验教训，制定并明确了未来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尤其是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确立，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中共三大结束后，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中国工人运动迅速迎来了复兴和再次高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4.
- [2]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1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6.

- [3]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561.
- [4]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22.
- [5] 《共产党广东支部<敬告罢工海员>传单》(1922年2月9日).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党的创立时期》[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14.
- [6]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74-75.
- [7]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C].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3: 107.
- [8]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C].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3: 108.
- [9]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N]. 《向导》周报(第20期). 1923-2-27.4.
- [10]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M], 1953: 105.
- [11] 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六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4.
- [12] 参见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中共“三大”资料[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176.
- [13] 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中共“三大”资料[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175.
- [14] 下文文中关于《劳动问题议决案》的引用参见劳动运动议决案(一九二三年六月)[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1-12.
- [15]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9.
- [16]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8.

- [17] 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六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4-5.
- [18]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日-20日之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C].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63.
- [19] 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六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1.
- [20] 吴敏娜. 统一战线源始略论——中共三大研究[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43.
- [21] 曾庆榴. 广州国民政府.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M], 1996: 246.
- [22]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省港大罢工资料[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112.
- [23] 瞿秋白.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420
- [24] 钱义璋. 沙基痛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13.
- [25]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239.
- [26]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省港大罢工资料[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733.
- [27]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编. 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大事记（1881-1949）（内部发行）[M]. 1988: 132.
- [28]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33.

【责任编辑：谭建军】